

[美] 裴 斐(Nathaniel Pepper) 访问整理
韦慕庭(Martin Wilbur)

吴修垣 译
高云鹏 译审
马 军 校注

从上海市长到“台湾省主席”

(1946-1953年)

吴国桢

Wu Guozhen Koushu Huiji

口述
回忆

责任编辑 曹培雷
封面装帧 甘晓培

从上海市长到“台湾省主席”(1946—1953年)

——吴国桢口述回忆

[美]裴斐 韦慕庭 访问整理

吴修垣 译 高云鹏 译审 马军 校注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200020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

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9.5 插页 4 字数 192,000

1999年11月第1版 1999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8,000

ISBN7-208-03333-1/K·790

定价 17.00 元

出版说明

本书是根据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教授裴斐、韦慕庭采访吴国桢的英文稿翻译而成。英文稿经吴国桢认可后，藏于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。从60年代起，英文稿沉寂在该图书馆已30多年了，如今在吴国桢族侄吴修垣教授的孜孜努力下，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吴国桢夫人黄卓群女士的支持下，该书得以翻译出版。

吴国桢曾是周恩来的同窗好友，1921年赴美留学，1926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学位。回国后，吴立志于从政，在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中央，先后担任过汉口市长、外交部政务次长、中央宣传部长等重要职务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即1946年5月始，他担任了上海市市长。蒋介石退踞台湾后，在美国政界的支持下，1949年12月，吴国桢出任“台湾省政府主席”一职。从上海市市长到“台湾省政府主席”的七年中，吴国桢经历了国民党的巨变，亲历了许多重大事件，是历史的见证人。在他的口述回忆中，记述了这些事件发生的幕后原因及其结果，字里行间，透露出对国民党政权和蒋介石的强烈不满；道出了国民党政界病入膏肓的腐败；展现出他与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间惊心动魄的争斗，是局中人讲幕后事。由于本书内容独特，鲜为人知，不但可读性强，而且具有重要的研

究价值。

但吴国桢作为蒋介石的亲信,国民党中炙手可热的大员,他的立场和观点显然与我们有着分歧,某些叙述和评论并不符合历史事实,书中一些遣词用句亦具有明显的倾向性。但为了让读者清楚地了解作者口述回忆的原貌,我们在翻译出版此书时,除极个别处外,未作删改,仅作了技术性的处理;书中对逃往台湾的蒋介石仍称作“总统”、“委员长”,对台湾当局一些机构仍称“中央政府”、“国民大会”、“外交部”、“国防部”等错误提法未加引号,请读者注意鉴别。

本书由吴修垣教授翻译,高云鹏先生译审,马军先生校注。吴修垣教授和高云鹏先生精通英语,具有很高的翻译水平;马军先生是研究吴国桢的专家。尽管如此,书中难免会有不足之处,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编 者

1999年10月

序 言

熊 月 之

本书是吴国桢口述历史的整理稿，主要记述自 1946 年至 1953 年之间吴国桢亲历亲闻的重要事件。

吴国桢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，是国民党内一位有学识、有能力的官员。在中央，他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、外交部政务次长；在地方，担任过汉口市市长、重庆市市长、上海市市长，1949 年以后还担任过“台湾省政府”主席。他曾是 1949 年 1 月毛泽东宣布通缉的 15 名主要战犯中的第 10 名；他曾是蒋介石的亲信，与宋美龄、宋子文、陈诚等交往密切；他与周恩来是关系相当不错的同学；他是留美归国的博士，与美国政界、新闻界有广泛而密切的联系。在 20 世纪 40、50 年代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中，他是重要当事人，有时还是政治漩涡的中心人物。

本书记述的这段时间，是历史大转变时期，先是抗日战争胜利，随后是国共内战，再后来是国民党在大陆失败，退踞台湾，共产党取得在大陆的胜利，几年之间，波谲云诡，天翻地覆。这段时间是吴国桢从政活动的高峰期。他先是担任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市的市长，经历了学潮、工潮、舞女风潮、金圆券风潮等一波又一波的惊涛骇浪，然后是无可奈何地逃离上海，

在台湾担任“省政府主席”，卷入台岛争权夺利的漩涡，再后来与蒋介石的矛盾尖锐化，最后死里逃生，离开台湾到美国定居。

可以说，本书是非常时期非常人物非常经历的生动写真，具有他书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。

总结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，是此书的重要内容。吴国桢早年在美国攻读的是政治学，归国后在政坛活动多年，对国民党政权从整个体制、运作过程到重要官员的素质知之甚深，对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垮台有切肤之痛。他在远离了政治漩涡之后，对这段历史进行了认真的总结。这在书中有多处表露。他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垮台的原因归纳为四点：一、国民党政权的糟糕领导和管理腐败，特别是漠视民众的改革要求；二、群众和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的性质缺乏真正的了解；三、美国采取的政策有错误；四、俄国对中共的援助。这些归纳反映了他的立场，有的显然与事实不符。但他对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，看得相当真切，有些分析相当深刻。比如，他描述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情况，令人触目惊心。

其一，克扣军饷，军官经商：

答：……将军们经常要给部队发饷，但物价猛涨，他们又贪污，所以钱很少直接发给士兵，而是进了将军们自己的腰包，他们又用这些钱囤积商品投机赚钱，这样就进一步抬高了物价。

问：把军饷付给指挥官，这是旧的体制？

答：比那还糟。我经常到上海码头去，那时我们的部队都集中在东北，我看到一箱箱运往东北给部队发饷

的中央银行钞票。但一两周后，当我再到码头时，同样的箱子又从东北运回来了，显然指挥官们并未给部队发饷，而是将其运回以购买商品进行囤积，此后将其在黑市抛出，获得巨利，只用所赚的一部分给部队发饷。我将这一情况报告给蒋介石，但他未做任何处理。

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声称部队缺少汽油，要吴国桢帮助解决。吴经过努力满足了汤的要求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吴的下属报告说，汤将军的司令部正在黑市上抛售汽油。

其二，吃空额，冒领军饷。吃空额、纸上兵是国民党军队腐败的另一普遍现象。一个师本应有1万人，中央政府按这个数字发饷给指挥官，但实际人数可能只有7千，甚至更少，多余的钱自然进了指挥官的腰包。吴国桢当上海市长时，深知此弊。他在为京沪杭警备部队筹饷时，便要求在清点士兵的前提下，按实有人数发饷。汤恩伯同意照办。吴以为这样一来可以有效地堵住罅漏，谁知几天以后，他从一个方丈那里获悉，在清点士兵时，庙里的300多名和尚都被事先安排穿上了军服，冒名应卯。真是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！

国民党政府的腐败，与其制度有关，但与最高领导对待腐败的态度也有直接关系。吴国桢谈到，国民党军队的腐败，与蒋介石对待腐败的态度有密切关系。

问：吴博士，你与汤的事件，是否也清楚地说明，为什么中国(国民党)部队不能以良好的士气投入战斗？

答：整个领导都烂掉了。在这点上，我甚至也不能排除蒋介石本人，他比其他任何人都应更多地受到责备，他从不知道如何授人以权，尽管他精明，但却自负，以致

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最好的战略家。当位于南京以北约100英里的徐州激战正酣时,我到他家中的办公室去,见他正用军用电话指挥作战,他实际上是越过野战司令官,直接给师长们下命令。他多半是以对他本人的忠诚与否,而不是按他们的能力来挑选指挥官,只要一个人对他忠诚,有点腐败他也不在乎。在我认识的所有中国将军中,只有一位我很尊敬,那就是孙立人将军,其他的多多少少都有点像汤恩伯将军。

这就把腐败的产生与统治者的独裁联系起来。吴国桢同意这样的看法:与其说是共产党赢得了大陆,还不如说是“国民党把它丢了”。

口述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生动,有细节。本书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,如吴国桢与周恩来的交往,吴国桢处理学潮的经过,发行金圆券的决策过程,毛泽东通过颜惠庆策反吴国桢的经过,蒋介石企图暗杀吴国桢的细节,绘声绘色,相当具体。这些,都可以作为其他史书的补充。吴国桢是少数几个在大陆与台湾都做过行政长官的人物,对大陆、台湾的民情都比较了解。他生动地记述了台湾人民热爱、忠诚于祖国的深厚情感:

在这里,我要强调一下他们对中国的忠诚,这是西方人经常争论的问题。所有的台湾人都是爱国的中国人,如果不是对国家,至少也是就种族而言的。有一件西方人没注意到的事情,就是在日本统治的50年中,发生过120次台湾人的反日起义。日本人曾尽一切可能想同化台湾的中国人,强迫他们说日语,并甚至一度命令他们将

中国名字改为日本名字，中国人采取各种逃避方法进行反抗。如果你既知道普通中国人的姓，又知道普通日本人的姓，你就会觉得这很有意思。如果一个姓“吕”的人要改名，他就将其改为“宫内”，这是日本的姓，宫之内是什么？只能是吕。再拿一个姓刘的中国人来说，这人就不能像姓吕的那样找到托词，但中国刘姓有名的祖先之一是中山王，恰巧“中山”是日本人普通的姓，因此姓刘的人都改姓中山。

本书是访谈录，原为英文，由吴修垣先生译成中文，高云鹏先生译审，马军先生校注。吴先生是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资深教授，精通英文，作为族侄与吴国桢有过交往。高云鹏是大连译达翻译咨询事务所主任，长期从事翻译工作。马军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青年学者，就读研究生时所写的硕士论文便是《论上海市长吴国桢(1946—1949年)》，对吴国桢有一定研究，因此其所作校注，对吴氏误记和文饰之处，作了匡正和摘发。比如，吴国桢被任命为上海市长的时间，吴误记为1946年5月17日，马军在注释中指出实为5月14日。阎锡山担任行政院长时的年龄，吴说“已年过70”，马军指出其时阎仅67岁。1948年2月2日，申新九厂工人罢工，吴下令镇压，发生了著名的“二二惨案”。对于这次惨案，吴说“警察开了枪，只有一人受伤，不是枪伤，而是由于践踏”。但事实是，警察对工人开了枪，有3人死亡，数百人受伤，其中重伤42人。马军在注释中对此特加说明。对于书中提到的中外人物，也尽可能地作了附注。这些，都加大了本书的学术含量，有助于读者对本书的理解。

口述历史在国外已有好几十年的历史,关于口述历史的学会、杂志、书籍在坑满坑,在谷满谷,在国内也已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,方兴未艾。有计划地翻译、介绍一些国外的口述历史的成果,对于国内口述历史的发展,无疑大有裨益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本书的翻译、出版,也是很有价值的。

1999年8月14日

前 言

“中国口述历史”(Chinese Oral History)是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(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)东亚研究所(East Asian Institute)自60年代初开始进行的一个重大史学项目,口述历史研究部(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)亦参与具体工作,旨在采访中国现代史中的知名人物,其中尤以国民党军政人物为主要对象。吴国桢口述回忆即是其中的一例。

1960年11月1日至11日,吴国桢在纽约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裴斐(Nathaniel Peffer)^[1]的录音采访,由于吴氏熟谙英语,谈话全部用英语进行,内容主要有关1946至1953年吴国桢任上海市长和“台湾省政府”主席的经历,以及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。在访谈的最后一天,韦慕庭(Martin Wilbur)教授^[2]

[1] 裴斐(1890—1964年),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曾任上海《大陆报》驻北京通讯员,1946年秋由美国国务院派遣来华,在北平、上海等地进行演讲。著有《中国:一种文明的衰萎》(China: The Collapse of a Civilization)、《我们必须对日作战吗?》(Must We Fight Japan)、《远东近代史》(The Far East: A Modern History)等。

[2] 韦慕庭(1908—1998年),美国中国学家。1932年来华,在北平美国传教士办的华语学校进修两年,回国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,1947—1951年任该校中国史副教授兼东亚研究所副研究员,1957年后任教授兼所长。著有《中国的乡村政府》(Village Government in China)、《中国西汉的奴隶制》(Slavery in China during the Former Han Dynasty)、《孙逸仙——壮志未酬》(Sun Yat-sen: Frustrated Patriot)等。

也参加进来,就中国现代史的若干基本问题向吴氏征询了意见。此后的两年间,裴、韦、吴三人陆续对录音稿作了修订整理,经划分章节,添加大小标题,最后以微缩胶卷的形式收藏在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(Butler Library)的稀有书籍与文稿室。

我们认为这是一份相当珍贵的史料,征得哥伦比亚大学及吴国桢夫人黄卓群女士的同意,将其全文译出,以飨学界。该微缩胶卷的原标题名是 *Reminiscences of Wu Kuo - cheng for the Years 1946—1953*, 现书名为译校者所加。原稿中本无注释,现有注释由校者撰写。

译校者

1999年7月

吴国桢简历

马 军

吴国桢，字峙之，又字维周，1903年10月21日生于湖北建始县凉水埠。父吴经明，母朱芷英，兄吴国柄。吴氏幼年时随父旅居北京，就读于府学胡同小学。1914年入天津南开中学求学，与周恩来、张道藩、段茂澜等同窗，尤其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1917年转入北京清华学校辛酉级留美预备班，同学之中有罗隆基、闻一多、潘光旦等，吴国桢与他们一起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。

1921年从清华学校毕业后，吴国桢获选赴美国留学。1923年毕业于美国依阿华州格林内尔大学(Grinnell College)，得经济学学士学位。1924年又获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(Princeton University)硕士学位。留美期间，吴氏勤奋好学，曾获得过多种高级奖学金。1926年，他的论文《中国古代政治理论》(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eories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)通过答辩，遂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学位。同年秋归国。

回国之初，吴国桢应张君勱校长聘请，曾短期出任上海国立政治大学教授。但其志毕竟不在学术，而在从政，旋即加入中国国民党。1927—1928年间先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江苏交

涉员公署秘书兼交际科科长、外交部第一司副司长、条约修改委员会委员等职。1928年起转赴华中任职，历任湖北省烟酒税务局局长、汉口市政府简任参事、市土地局长、市财政局长、湖北省财政厅厅长、财政部西岸樵运局局长、全国财政专使等。1931年春，吴在汉口与名媛黄卓群女士结婚，后生有两女两子。

1932年初吴国桢临时担任过蒋介石的私人秘书，蒋对这位年轻练达的留美博士印象至深，很快任命他为汉口市市长，吴时年仅29岁。吴国桢任市长期间，热心城市建设，主持修建中山公园、沿江大堤，筹划建造市一男中和市一女中，并翻修拓宽了市内10多条马路，颇得各方赞誉。1938年6月，日军进逼武汉，吴氏肩负战时动员、支援前线、组织疏散等重任，坚持至最后时刻撤离。

1939年春，吴出任国防最高会议政务厅长。同年底，任重庆市市长兼市防空副司令。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，人口激增，敌机轰炸频繁，吴排除困难，多方谋划，竭力解决衣、食、住等供应问题，救死扶伤更是重中之重。1941年6月5日，由于日机长时间空袭陪都，校场口大隧道（防空洞）发生窒息惨案，数千人死亡。吴作为主管官员之一难逃责任，遂受到革职留任处分。1942年12月，吴氏改任外交部政务次长，因部长宋子文时常访美，吴多次代理部务，参与缔结新约，先后任互换中英、中比条约批准约本全权代表。在1945年5月的国民党“六大”上，吴国桢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。同年8月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。

抗战胜利后，鉴于钱大钧主政上海不力，蒋介石决定起用

自己的“市长专才”，1946年5月吴国桢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。吴氏主沪的3年，正逢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内战，沪地频受波及，物价飞涨，工商败落，民生困苦，动荡不已。吴为回报蒋的厚望，来回奔命，日夜劳顿，可谓付诸了全力。也正由于始终处于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对立面，1948年12月吴被中国共产党列为战争罪犯。次年4月因病辞职，离沪赴台。

由于吴国桢受欧风美雨影响很深，工作作风确与一般国民党军政官员不同，所以其“民主”仪态逐渐博得了海外特别是美国政界的赏识。国民党失去大陆以后，美国政府一时采取了置身于外的态度。为了摆脱困境，保住台湾，蒋介石决定重用吴国桢，以便吸引美援。1949年12月吴国桢就任“台湾省政府”主席兼保安司令，次年3月兼“行政院”政务委员，8月又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。在1952年10月的国民党“七大”上，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常委会委员。吴氏主台期间，大量起用台籍人士，着力于地方“自治”和农业改革，力图将台湾建成“反攻大陆”的基地。但是，他所迷恋的“民主政治”逐渐与蒋氏父子的特务政治发生冲突，而且愈演愈烈。朝鲜战争爆发后，美国改变政策，全力支持台湾当局，吴国桢在对美关系中的作用已大为下降，蒋介石对吴终于不能容忍。1953年4月吴辞去“台湾省政府”主席一职，旋即请假赴美。

1954年2月，吴国桢藉美国新闻媒介强烈抨击蒋氏父子独裁和专制，斥责他们力图建立一个警察国家。他还多次向“国民大会”和蒋介石公开上书，呼吁实施“民主化之措施”。面对吴氏的“窝里反”，台湾当局大肆展开舆论讨伐，双方进行“隔海大战”。3月，台湾国民党当局宣布解除吴国桢政务委

员和中常委职务,并开除其党籍。

吴国桢与台湾当局决裂后,先是住在芝加哥附近的埃文斯顿(Evanston),靠替报纸撰稿和演讲为生。1965年迁居佐治亚州的萨凡纳(Savannah),并应聘为州立阿姆斯特朗大学(Armstrong State College)东方历史和哲学教授,直至1974年退休。1982年凝聚了吴氏多年心血、专门研究中国上古文化的英文著作《先圣遗绪》(The Chinese Heritage,又译《中国的传统》)得以正式出版。

吴国桢晚年关心国内发展,对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开放政策极为赞佩,曾应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邀请,拟于1984年9月回国访问,并参加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庆典。然而天不遂人愿,6月6日他在美国的寓所突然去世。

吴氏的重要著作还有:《永定巷》(The Lane of Eternal Stability. New York: Crown, 1962)、《美国为什么不能很好地理解亚洲事务?》(Why is America not Better Informed on Asian Affairs?. Savannah, GA: 1968.)

目 录

序 言	熊月之 1
前 言	译校者 1
吴国桢简历	马 军 1

一、战后早期的问题与蒋介石控制的特性..... 1

1. 敌产接收中的腐败	2
2. 政府为什么没能控制住“投机牟利者”？	9
3. 情有可原的情况：战时受损	11
4. 蒋介石作为领袖的品质与责任	12
5. 当蒋介石私人秘书的体验	16
6. 蒋介石的嗜权及通往独裁之路	17
7. 蒋介石的用人术：分而治之	20
8. 抗日的坚定性	23
9. 下属对蒋介石的影响	26
10. 蒋介石精明而狡黠	27

二、我任上海市长时的问题 30 |

1. 某些行政困难	31
2. 共产党鼓动学生游行	32